

科學譯叢

古生物學：第2種

論蘇維埃古生物學的現況

(第二集)

沙萊契娃等著

中國科學院出版

3.4
421.6

圖書集成

自然科學部 地理彙編

歐羅巴洲古生物學的現況

(第二卷)

李德裕著

中國科學院出版社

科學譯叢

古生物學：第 2 種

論蘇維埃古生物學的現況

(第二集)

T. Г. 沙萊契娃等 著

錢 競 陽 譯

中國科學院出版

1954年6月

論蘇維埃古生物學的現況 (第二集)

原著者 Т. Г. Сарычева и др.

翻譯者 錢 競 陽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編譯局

出版者 中 國 科 學 院

北京(7) 文津街5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廠

佟 麟 閣 路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譯) 54032

1954年5月第一版

(自) 021

1954年5月第一次印刷

(京) 0001-2,700

開本 $787 \times 1092 \frac{1}{25}$

數字: 57 千字

印張 $3 \frac{19}{25}$

定價: 5,00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繼古生物學第一冊“論蘇維埃古生物學的現況”之後介紹蘇聯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所討論的蘇聯古生物學的現狀、發展和偉大任務以及對柏里俠克學派和古生物研究所的評價問題。

第一篇和第二篇論文中主要是反駁達維大希維里對蘇聯古生物學的不正確不全面的估價和對柏里俠克院士及其學派的攻擊。同時引用了1958—1959年的文獻記載來說明蘇聯古生物學和柏里俠克的成就，有系統地研究了古生物學中存在的若干問題並提到古生物學研究對國民經濟服務問題等，第三篇是該文作者對古生物研究所所長奧爾洛夫的批評，指出奧爾洛夫沒有深入地檢查古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並對柏里俠克在古生物學中的貢獻提出了許多引證。

由這本書可以看出蘇聯古生物學家對蘇聯古生物的現況、發展，特別是對古生物研究所及柏里俠克院士的評價有着不同的見解和評論，也可看出蘇維埃科學家在怎樣的開展學術討論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

目 錄

關於蘇維埃古生物學現況的問題·····	T. I. 沙 萊 契 娃 (1)
論蘇維埃古生物學現況問題·····	M. B. 庫 里 柯 夫 (34)
論一個古生物學“學派”的嚴重 的理論錯誤·····	C. P. 米庫林斯基 (59)

關於蘇維埃古生物學現況的問題

T. Γ. 沙萊契娃

達維大希維里以“蘇維埃古生物學現況及其發展的展望”一文引起了科學界對古生物學問題的重視。確實，在這地質工作空前未有的蓬勃和廣泛發展的時代，在這創造性的米丘林生物學空前繁盛的時代，全然有必要批判地重新審查古生物學方面的成就，同時揭露一切的缺點，實事求是地加以討論，找出消滅缺點的途徑。

古生物學對國民經濟有怎樣巨大的意義一點，已無庸詳述，這是衆所週知的。同樣，古生物學對想像地球上生物發展史的作用以及解說統治着這些發展的規律的作用也不言而喻了。古生物學家沒有可能對自己收集的材料進行實驗，像研究近代資料的生物學家所能做的那樣，他們可以強使動植物的天性向人類所需要的方向轉變。但是，當生物生存的一切情況都適應着地球表面各種變化而變化，引起居住在某種地質構造地區上的生物不斷變化時，古生物學家就有可能觀察研究“大自然”的實際結果。生物變化和生活環境變化的這種緊密的聯系，常常是這樣明顯得使每一個研究歷史發展中生物形態的古生物學家一目了然，以致難怪古生物學家中極大多數是拉馬克主義者，也就因此往往遭受所謂正統達爾文主義者的攻擊。

在生物變化上看出外界影響結果的這種可能性，使古生物學家的工作就在目前，在我國達爾文主義創造性發展的時期中具有巨大的理論意義。

古生物學就在思想戰線上——爭取製定出最廣大羣衆中唯物世界觀一點上也具有很大的意義。真正的化石遺骸確鑿證明地球上生物發展史的資料的出現，是反宗教宣傳的一個最有效的手段。所有那些那怕只有一次和很關心過去生物關心掌握其發展規律的廣大聽衆有過接觸的人，那些必須回答這些聽衆的各式各樣許多問題的人都清楚地看出並懂得這一點。遺憾的是，本來就想在文內第一節就對此門學科的科學和實用意義加以剖析的達維大希維里，正是對古生物學有作用的這方面完全忽略了。

達維大希維里之文，除序論外，可分成輕重不同的4部分：1. 從科瓦列夫斯基到目前我國古生物學研究的發展，只敘述了1頁(!)；2. 有關柏里俠克的各方面——共2頁半；3. 論“柏里俠克學說”和其學派之現況——8頁；4. 結論——包括論蘇維埃古生物學情況，今後發展方向，理論和實踐方面的任務等等重要結論，及改正不正確道路的“具體”建議，共佔1頁。

由上列分析可以看出，文內對所提問題是解說得非常不勻稱的。無論柏里俠克在蘇聯古生物學中的作用是如何巨大，總之只是針對他，或者更準確的說，只是批評他的觀點，就差不多佔了全文的一半，而此文，照其標題判斷，應當是全面研究蘇聯古生物學的，所以那就未免太多一點了。如果同時再計算一下，就是其範圍的第2部分——論“柏里俠克學說”的現況

——基本上在頗大程度內仍然是關於批評這位科學家的思想，那就是說，古生物學的展望和當前任務的其他重要問題只剩全文篇幅較少的第4部分了。顯然，此文更正確的標題應是“柏里俠克及他在蘇聯古生物學中的作用”。很清楚，一般性的論文應是解說和詳細研究古生物學中所討論的主要問題，但作者沒做到這點。此文仍像其在以前所寫的批評文章一樣，全部內容可歸結於所有古生物學家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是不怎麼誠懇地給柏里俠克的批評。這裏，有趣的是，柏里俠克的許多最能全面反映其科學觀點的巨著中任何一種，達維大希維里都完全不加批評。

應當認為，達維大希維里辯論文章的目的是要全面審查我們古生物學的不正確的方針，照這位作者之意，古生物學在柏里俠克思想的影響下，走上蘇維埃科學不應有的道路——脫離實踐，對理論的創造性發展毫無貢獻。

當我拿到此文時，首先就開始讀結論。無論全文寫得多好，而結論部分和具體的建議往往就是評價它的準則。我們每一個蘇聯科學家，不能在工作中對下列各點漠不關心：有多少符合了實踐的需要，有多少對我國共產主義建設有了幫助，在思想戰線的鬥爭上作了怎樣的貢獻。

正因我是認為達維大希維里論文的結論部分會有特別的意義，所以我就先從結論來研究。

結論分兩部分，一是斷定缺點，一是指出改正缺點就是今後的工作。這裏，我將不注意作者對柏里俠克及其“學派”的攻擊——甚至在這總結部分也充滿攻擊字句的。這些攻擊，可以

說很顯明的指望讀者能全部信任地接受作者的意見，因為它實在是被寫得非常肯定而是無容懷疑的。

現在我們僅注意達維大希維里總結中的事實部分，這對我們是有最大意義的。

*

*

*

蘇聯古生物學的主要缺點，據作者總結是這樣：“……這門學科的現況怎樣也不能令人滿意，相反地，它却使那些對蘇聯自然科學的前途有興趣的人深感不安”，根據他的意見歸結成如下各點：（1）理論問題研究落後於實物的蒐集，因為直到現在還沒有着手有計劃地往這個方向進行工作；（2）對反動的、反科學的資本主義科學家的理論的鬥爭性不強；（3）研究古生物學中新的有實效的方法不够努力，這就是它所以對國民經濟的服務不能令人滿意之故；（4）對自己的缺點毫無克服的表現，領導古生物研究起決定性作用的許多活動家對此則保持緘默，沒有主動去努力克服它。

達維大希維里是正確的——其所列舉的前三個缺點，的確是非常遺憾的存在着，有的是更大些，有的是更小些。但是決不能說對缺點是保持緘默的，也不能說對缺點是毫無鬥爭的。他也低估了已有的努力和在研究工作的新方法中已獲得的成果，這些新工作方法已完全滿足了實用上的要求。

我們來看事實，蘇聯古生物學家從1938年起不止一次地參加了許多次是蘇聯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發起的會議，在科學院生物學部門之內來討論古生物學的當前任務 也就是，古生物學對地質學最有效的服務的方法，及與此有關的理論問題。同時

進行了經驗交流，作出已完成的工作的總結，指出進行今後研究的配合和佈置力量的方法。毫無疑問，達維大希維里完全知道這些，但是他為什麼還認為有可能使不甚了解蘇維埃時代古生物學發展個別階段的讀者們進入迷途呢！

事實是最確切的證明者，所以我現在只介紹一些事實資料給讀者看。現摘錄一些蘇聯科學院在 1938 年 4 月 13 日至 16 日召開的第一次古生物學家會議的決議：

“會議的任務是討論古生物學直接服務於蘇聯各機關所領導並由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參加的地質測量和地質勘察工作的問題。”“20 年來達到的成果是巨大的……。但是，蘇聯古生物學在各方面的情況還沒有配合上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速度……對地質工作的服務遠不能令人滿意，理論的（生物的）基礎還落後……。”

在這內容豐富的決議內繼續指出領導古生物研究的各機關的具體缺點，也指出在今後工作中怎樣消除這些缺點的方法。其中關於古生物研究所的是：

“除了已有的成就……必須指出對化石最重要的門類還沒有全部研究……思想戰綫上的工作還作得不够。

所以，今後應當在理論方面深入並擴展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題目。研究所在參加研究生物學的主要問題，包括進化的問題時，在擔任起蘇聯古生物學的總的發展的責任時，都應當替經常的古生物地層學工作建立生物學基礎，從而有計劃地對蘇維埃服務。對這種工作的嚴格要求特別可從各地的報告中看出來，各地的報告書都指出，缺乏這種工作將會妨礙今後真正的

對地質勘察工作的服務。”

決議繼續具體建議研究所參加古生物學服務的工作，同時也詳細地研究了其他單位主管的古生物機構的任務。

在 1939 年 1 月，由於尋找俄羅斯地台和烏拉爾山的古生代地層油礦工作的開展，古生物研究所就召開了研究烏拉爾山和蘇聯歐洲部分古生代動物羣的會議。這個會議的決議指出，蘇聯古生物學家在古生物理論和實踐上的工作除成就外，同樣也有缺點，並指明改善工作的具體方法。正同過去一樣，這個會議是柏里俠克直接領導進行的，並是積極參加這兩個決議案的擬製人。決議的特徵是不怕應有的批評，因為柏里俠克一直認為，正是批評才是克服缺點的最好方法。所以在這些決議中確認缺點一事才佔了這麼大的地位。

缺點中主要的是在理論戰綫上工作仍然脆弱，還有就是：“缺乏古生物研究的統一計劃，以及各領導機關本身工作遠未做到足够的配合，這就不能充分地，在準備蘇聯國民經濟的原料基礎上，利用古生物學的方法。”（“古生物學評論” 1940 №2）

其次，這個決議針對古生物學的任務上有：（1）建議組織附屬於蘇聯科學院的專門委員會來有計劃地佈置古生物學研究，由此建立最完整的科學基礎，根據第 3 個五年計劃來發展地質勘探工作；（2）詳細列舉那些是首要的古生物學工作；（3）作至今仍有價值的古生物學專門方法的指導工作。決議又特別指出，古生物學方面的工作在遍及廣大有長遠歷史的化石地區並以之作爲有機體居住環境來估定其地質發展史時，應與地質研究工作密切接合進行。

可見，遠在 1939 年初就已提出並討論和擬定了古生物學的基本任務，這差不多完全和 15 年後達維大希維里的意欲發動辯論的批評論文內所規定的一樣。

就在 1939 年終，地質部屬下的全蘇地質科學研究所召開了一次地層古生物學會議。誠如勃切林采夫所說：“這是 1938 年 4 月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召開的討論蘇聯組織古生物學服務一般原則的會議的一個直接繼承會議。”

亦即在 1939 年所開會議上，達維大希維里曾作一個題為“組織古生物學方面的理論研究工作”的報告。在此報告內，他採用了柏里俠克所建議的，古生物學會議所贊同的思想體系來對待研究蘇聯南方第三紀區域化石動物羣的具體工作，並且號召要以該地的地質生命發展為背景來研究化石。

以後，他屢次重複這種見解時，而沒有在任何文章內指出這個見解曾在柏里俠克組織的生古物學家會議上討論過並通過了的。基本上達維大希維里在一些論文和最近此文內所提意見都就是那個同樣的意見，可是這裏他還埋怨“柏里俠克學派”，說它的“壟斷”百般地阻止了這樣的研究佈置和“輕視”了他的關於制定古生物研究發展的總計劃”的建議。

這裏應當指出，蘇聯古生物學工作的配合和統一佈置古生物學家人力的問題，不僅在會議上已討論過，而且也公佈了。所以，1939 年我在“論組織蘇聯古生物學研究工作”一文內這樣寫過：“為使工作有可能在高度理論水平下進行，古生物學家已不能再對目前已有的各種古生物著作中描述的零散的，偶爾獲得的資料滿足了。他們應當研究某地區各地層的動物羣的複雜

整體，這樣對長時間內居住在不同岩相的地區上的動物羣的發展就可有一個總的概念。”同文內並具體指出完成這個巨大工作的方法及其實現不是個人的能力所能及的問題。“但是不應忘記：在蘇聯具有的各種條件下，也不應該有單獨工作的科學家。假如國家需要解決某種問題時，那末整個的專家工作隊都會被動員起來。”這些集體性的工作，照作者看來，必須吸引地方上各機關的一定的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共同參加進行的。遺憾的是，事實上連實行上述這種正確措施也並非經常十分成功的。

所以，雖然自 1938——1939 年的會議以來已過了若干年，但是遵照各次會議中所指方針而進行的集體工作，無論是已完成的或將完成的，却為數不多。但非常值得重視的是，這種類型的工作在蘇聯各地（薩拉托夫、托姆斯克等）已被佈置了。可見，柏里俠克的思想，在這種情形下，已不僅是停留在紙上，而是廣泛地浸入到各古生物機構的經常工作的實踐中，並至今對它們是非常有用的。

最近數年來，我們眼見古生物學的飛速發展，而且特別要強調的是它在邊區地質機構和高等學校中的蓬勃生長。因此現在已產生更大的力量來要求用新的，米丘林學說的原理來研究古生物學的理論問題，同時，地質學在越漸詳細劃分地層（層系統）方面的不斷提高的要求，又重新將所有古生物研究方法中重要的問題提到工作日程上來，這些問題遠在柏里俠克生前，戰爭以前就開始被研究了。

1951年在這方面可作為特別的標誌，在這一年，對提出和

討論古生物學的理論與實踐方面的主要問題上，所發揮的積極性達到戰後幾年來的最高潮。

這一年內舉行了兩次有關石炭紀和泥盆紀的地層學討論會，會上起領導作用的是古生物學家。由於他們工作的成果，第一次勝利地不僅根據同樣標準的化石對照來準確地對比個別的地區，而且還對比了有各種複雜化石遺骸的不同岩相的地區。

應當指出：還是由柏里俠克所提出的研究動物羣整體必須以研究該地地質史為背景的這種觀念，也就是專門古生態研究工作所執行的這種觀念，是這兩次大會的決議案的組成部分，而這些決議，以後是被石油工業部作為給地質勘察石油各機構的指示的。

1951年3月，召開了全蘇地質研究所理論問題討論代表大會，會上，無論是在主要報告中（馬爾科夫斯基和羅塔伊），還是在展開的辯論上，都證實上述1939年古生物會議決議中所指出的古生物研究的任務和方法各點，都證實古生物研究應是全面的，不僅是包括生物的發展而且要包括其居住的環境。目前，這些研究方法已成為全蘇地質研究所籌劃編定國民經濟重要區域主要措施的憑藉。

終於在1951年5月，蘇聯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和蘇聯科學院地質科學研究所共同召開了古生代古生物會議，參加會議的是來自蘇聯各城市的58個古生物機構的代表。會議的任務是討論生物地層學的原則和討論以生物化石研究為根據的沉積對比的原則，同時還建立施用古生物學成就到地質實踐工作去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

雖然會議的主要目的單是實用的意義，但在會上仍提出並引起了魯任茨夫的重要的理論報告，題為“由米丘林學說論古動物分類上的主要問題”。辯論中大家指出研究分類學的理論問題，對地層學的實際工作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點在通過的決議案中也得到反映。

此次會議重新指出根據米丘林生物學最新成就來擴展古生物學理論研究的必要性。

在許多機構內進行集體的古生物的、生態學的、岩石學的工作之重要性同樣被指出，這種工作既完全符合主要理論要求，研究生物在外界條件變化的影響下的發展，也符合了實踐工作中對建立詳細劃分地層和解說沉積物形成的規律及沉積礦床成因等方面的要求。必須大力開展這種類型的研究工作，因為目前它的進行範圍還不能滿足實際的需要。

會議上對討論加速和提高古生物工作質量的各種措施給與極大重視，因為這個工作和各生產機構中大量鑑定礦石是有直接關連的。

由上述一切看來，達維大希維里的斷言“統治古生物學派者的主要不幸……在於這些科學家沒有意識到有計劃的發展我們科學的必要性，沒有理解到要擬製若干年內的研究綱要，以一定的目的來說明地質時代過程中生物進化的原因、條件和規律”是多麼地沒有根據。

達維大希維里所謂對缺點的“緘默”和對實際問題的不夠注意同樣是毫無根據的，這只有故意漠視事實的人才會這樣認為的。我們覺得，最有實效的批評方法之一，像斯大林教導我

們的，是適時地掀起爭論的問題（目前則是古生物學工作方針的問題），在專門的擴大會議上自由地，創造性地展開討論。

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蓬勃發展的地質工作對古生物學家要求為使在經常的實際工作中應用古生物學方法的新的更有實效的形式。由於這些要求，所以編製鑑定圖譜、地圖、圖表、卡片記載及其他各種能幫助地質學家不僅在室內，而且在野外鑑定化石遺骸方法的工作就大大展開了。現在這些材料不僅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也在薩拉托夫、烏發、托姆斯克及其他各城市規模較大的古生物研究機構內編定。

雖然這些古生物方法的實際應用種類的範圍已廣泛擴展，但達維大希維里在談到古生物學家對實踐不夠關注時，卻從不指出這些。這也許就可證明他現在，和以前一樣，脫離實踐並不了解古生物學家的經常工作，或者是他故意地抹煞與自己無根據的結論相矛盾的事實。

最後我要指出，就在蘇聯古生物學家批評反動科學家的方面，情況也不是這樣令人失望的，像達維大希維里文內所寫“古生物學家對資產階級科學家的反科學的理論所給的反擊仍然很弱”的那樣。我們認為，以達維大希維里為代表的蘇聯古生物學家們，在與反科學理論的鬥爭事業中已完成了非常有價值的貢獻，如達維大希維里的詳盡著作“從達爾文到今天的進化論的古生物學史”是值得以斯大林獎金表揚的，鑑定蘇聯古生物學的實況時對此點是不能忽略的。

顯然，正如上文所指，這點也說明文章的內容和標題不符，按照標題，此文是應詳細研究蘇聯古生物學的全貌，但它